

电子图书



信息技术的结晶

人类文明的载体

网络的基本资源

说 明

这部《中国近代战争史》，是我们对中国近代史上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期间发生的各次主要战争进行初步研究的结果。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开始的中国近代史，是中国由独立的封建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历史，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艰难地进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这是一个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充满着战争与革命的历史大变动时期。从一八四〇年（清道光二十年）英国发动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中经以太平天国革命战争为主的各族人民起义战争，反抗英、法、日、俄、美、德等国单独或联合侵华的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反对八国联军侵略的战争），以及资产阶级领导的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辛亥革命战争，和反对帝国主义扶持的封建军阀的讨袁、护国、护法战争等，到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的八十年间，大小战争不下五十余次。这些战争，从性质上区分，基本上是两类：一类是帝国主义国家武装侵略中国，中国被迫进行的反侵略的卫国战争；一类是国内封建势力残酷压迫人民，人民被迫进行的反对封建压迫的战争。毋庸置疑，战争给中国社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和灾难，但它在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旧制度和保卫国家独立方面，却有着巨大的革命意义。通过这些战争，彻底暴露了清王朝所代表的封建贵族阶级及封建专制制度的反动腐朽的本质，证明其灭亡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清楚地显示出在封建主义长期统治下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反动社会势力及其总代表清王朝，绝不是一、二次冲击可以推翻和消灭掉的。经过七、八十年反复多次的武装斗争，最后才推翻了它，而要完全消灭封建势力，则是下一个历史阶段——无产阶级通过其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任务。通过这些战争，既暴露了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残暴性，也暴露了它们炮舰政策的虚弱性。它们在腐朽的清王朝面前，是气势汹汹不可一世的强者，但在中国军民的坚决抵抗面前，却显露出强盗的虚弱本质。当帝国主义者发觉不可能用武力霸占中国时，便进一步勾结和扶持清王朝，使之成为“洋人的朝廷”。与此同时，中国人民进一步觉醒起来，不但认清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是压在自己头上的两座大山，而且逐步认识到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既互相区别又互相统一，因而不断加强团结，坚持用武装斗争回答侵略者和压迫者。在一系列反帝反封建战争中，中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形成的不畏强暴、勇于抵抗外来侵略的为国献身的精神，和敢于反抗压迫剥削的革命战斗精神；但也反映出，人民及其军队的英勇战斗，没有先进阶级和先进政党的正确领导，并实行广泛的联合，要使斗争持久地发展和取得彻底的胜利，也是很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通过这些战争，还深刻揭示了军事思想、装备、训练和指挥落后的军队，即使数量甚多，也难以形成强大的战斗力，战胜数量虽少，但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指挥有方的军队，从而说明建设一支有战

斗力的军队，对争取战争的胜利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诸如此类的经验教训，在中国近代战争史上是很多的，也是很值得研究的。我们编写这部书，就是试图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和总结这一历史阶段的战争经验，探索其规律，使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人民如何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不屈不挠地为反帝反封建而浴血奋战，前仆后继地为新中国的诞生创造条件，以加深对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同时，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反侵略战争的经验教训，为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增强自卫能力，提供借鉴。

战争是敌对双方在一定社会生产方式基础上进行的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等各种斗争的集中表现。作为战争史，自然不能仅限于军事方面，但军事斗争毕竟是战争的主要形式，况且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斗争，在通史和专史中都有较系统的叙述和分析，因此，本书以军事斗争为主要内容。当然，在军事斗争方面，战争史也不可能对所有大小战斗及一切军事活动都详加叙述，只能以关系战争双方全局的军事活动和指导战争全局的战略为重点。由于每次战争都是在特定的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因而本书力求将战前及战争进程中敌对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等概况，作扼要的记叙，以期对战争爆发的原因及其必然的发展过程，作出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揭示其特有的规律性。又由于战争是关系到国家、民族、阶级、政治集团命运的生死搏斗，是一种以特殊的组织（军队）和特殊的方法（战略战术）进行的特殊的社会活动形态，它与敌对双方最高领导层的活动紧密相联，并强烈地表现出双方军队及一切参战人员的特殊的主观能动性，这种从上至下的主观活动的正确程度和努力程度如何，往往对战争的进程和结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本书对每次战争的叙述和评论，不仅注重对战争的客观物质条件的分析，而且特别重视对战争双方主观指导和主观努力的研究，以期从中找出经验教训。但战争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而且许多有关战争情况的第一手资料，或因相互保密、事后销毁而无从查考，或因毁于战火而不复存在，现存史料又多为当时中外统治阶级的官方记述，其中多有虚假不实之处，有的甚至是出于未经战阵的文人之手的不经之谈，这都增加了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困难；加上我们编写人员的理论水平、写作水平和历史知识有限，因而本书难免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热忱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根据中国近代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发展变化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战争发展变化情况，本书分为三册。第一册主要叙述 1840—1873 年间反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的战争和以太平天国为主的各族人民起义战争。第二册主要叙述 1873—1905 年间反对各帝国主义国家蚕食和企图瓜分中国的战争。第三册主要叙述 1905—1919 年间资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推翻清王朝和反对帝国主义扶植的封建军阀的战争。每册之后附有若干彩色作战示意图。第三册后面附有战争大事年表。

本书是由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研究部中国历代军事理论研究室的同志在田地同志主持下集体编写的。参加编写的有：施渡桥、梁巨祥、张一文、谢健、温国华、刘廷良、王楚良、邱心田、王兆春、王式金、毛振发、李硕之、吴如嵩、谢国良同志。牛俊法、王东明、戴学速、魏天柱同志也曾参加部分初稿的撰写或资料收集工作。第一、二册由施渡桥、梁巨祥、邱心田、王楚良同志统稿，第三册由施渡桥、毛振发、梁巨祥同志统稿。全书由高锐同志最后审定。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中国第一、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其它史学单位曾提供过不少资料，一些史学工作者提过不少宝贵意见，此外，本书还吸取了史学界一些研究成果，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 者

一九八三年八月一日

中国近代战争史

第一章 第一次鸦片战争 (1840年6月—1842年8月)

1840—1842年，英国殖民者对中国发动了一场侵略战争，其导火线是由于英国强行向中国推销鸦片，故称鸦片战争，也叫第一次鸦片战争。这次战争以后，中国由封建社会一步步地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1840年成了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第一节 鸦片战争前的世界与中国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世界资本主义正处于迅速发展时期。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英、法、美等）经过以机器代替手工劳动为主要标志的产业革命，社会生产力大幅度提高，创造了过去任何时代无法比拟的巨大的物质财富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日益加深了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资产阶级为了摆脱经济危机，贪得无厌地追求利润，对内加紧剥削、压迫工人和广大劳动人民，对外不断发动侵略战争，大规模地掠夺殖民地，开辟新的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

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在争夺殖民地的过程中，经历了许多次战争，建立了强大的武装力量，并随着工业的发展，不断改进军队的组织编制和武器装备。

由于战争频繁，战争的地域和规模不断扩大，欧洲各国的常备军不断增加。至十九世纪上半叶，整个欧洲约有二百万军队（战时倍之），其中为数五十万以上的有法国和俄国。英国当时主要是海上强国，陆军约有十四万，连同用于内卫的国民军，共二十万左右。鸦片战争前，欧洲除英国外，各主要国家已普遍实行征兵制，英、法等国还招募外籍雇佣兵。各国普遍设立培训军官的军事学校。法国曾规定所有军官都要经过军事学校训练。平时，大多数国家军队的最高编制单位通常是团，也有的编基干军；军（军团）、师、旅的建制多半在战时才采用。步兵一般以营为基本战术单位，编制人数在八百至一千之间。英军每营有十个连，每连九十至一百二十人；法军每营六个连，每连人数不等。骑兵一般以连为基本战术单位。

在武器装备方面，到十九世纪初，欧洲各国都能用生铁和铜铸造各种滑膛前装火炮，并依其口径与炮管长度之比例，区分为加农炮、榴弹炮和臼炮；炮身重量从几百斤、几千斤直至万余斤；口径从几英寸到十余英寸；炮弹有实心弹、霰弹、燃烧弹和爆炸弹（英国已发明空中爆炸的榴霰弹）；火炮的有效射程达到千余米。随着炮车的不断改进，火炮的机动性能大大增强，逐渐成为西欧各国作战的重要武器，有的在一次会战中，双方各自动用的火炮达四五百门之多。步枪的改进则比较缓慢，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始终以前装滑膛为基本型式。英军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使用的博克式和布伦司威克式

步枪，也都是滑膛枪，有效射程为三百米左右。

为适应对外贸易和掠夺海外殖民地的需要，西方国家十分重视发展海军。自1807年美国发明第一艘用蒸汽作动力的客轮¹以后，英国于1827年首先将蒸汽机装在军舰上。这种舰只可以不受风向和水的流向的影响，从而加快了航速，增强了机动性。但由于蒸汽机体积庞大，机器和燃烧用煤占了很大的面积和重量，以致装载火炮的数量大受限制，加以机器和划水轮都暴露在外，作战时易被敌方炮火击中，因此，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前后，装有蒸汽机的明轮船只一般只用于巡航、侦察、通信和短途运输。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英国的战列舰仍全部依靠帆力，大型战列舰有二至三层甲板，分别装备有七十到一百二十门火炮，发射三十二磅炮弹，舰首和舰尾装有可发射五十六和六十八磅实心弹的加农炮，或装有可发射爆炸弹的大口径加农炮。英国是海军发展最快的国家，1836年时，已拥有大小舰艇五百六十艘，并积累了许多海战和登陆作战经验，成为称霸世界的最大的海军强国。

英、法等资本主义列强，正是凭借装备有先进的军舰、大炮和具有战争经验的侵略军，实行炮舰政策，到处横冲直闯，打开了一个又一个经济不发达国家的大门。至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中国的一些邻近地区和国家，有的已经变成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有的正在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和威胁。中国也早已成为它们觊觎的对象。

当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向世界各地猛烈侵略扩张的时候，中国正处于封建制度没落和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由盛到衰的时期。

自康熙（1662—1722年）到乾隆（1736—1795年）年间，清朝封建统治者从王朝的“长治久安”出发，采取了一些客观上有利于休养生息的措施。经过各族人民的创造性劳动，使明末清初陷于崩溃的社会经济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人口不断增长^①，社会渐趋安定。与此同时，清军经过断续百余年的征战，平息了分裂叛乱，巩固了清王朝的统治，并使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封建国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统一。但是，从乾隆后期开始，清王朝的统治趋向腐败，整个统治机构变得因循守旧，死气沉沉；官场贪污成风，豪门贵族巧取豪夺，皇室骄奢淫逸，挥金如土，加上浩大的军政开支，造成国库日益空虚。到嘉庆（1796—1820年）时，国家财政已陷入捉襟见肘的困境。而解决财政困难的唯一办法，自然是加重对劳动人民的剥削。

土地兼并不断扩大，贵族官吏贪污腐化，和日益苛重的封建剥削，使社会危机不断加深，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加之满族统治者虽然口称“满汉一

¹ ① 1800年，亨利·贝尔在克莱德河上试制一艘汽船；1803年，富尔顿在塞纳河上试建明轮船；1807年，富尔顿向英国伯明翰公司定制引擎，安装在“克莱蒙”号轮船上，在赫德森河试验成功。

① 康熙中后期至乾嘉时，财政岁入均多于岁出。康熙四十八年，户部库存银已五千余万两，嗣后实行“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乾隆五十七年，岁入银四千三百五十九万余两，岁出银三千一百七十七万余两，约余银一千一百八十二万两。乾隆末年，人口已超过三亿。

家”，实际上是以满族为主，联合蒙族压迫汉族，联合蒙、汉贵族和大地主压迫各族人民，因而到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出现了以农民为主体的各族人民武装反抗清王朝反动统治的高潮。其中比较著名的有 1795—1806 年的贵州东部、湖南西部的苗民起义，1796—1804 年的遍及湖北、四川、陕西等九省的白莲教起义等。各族人民的起义，动摇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加速了它的衰亡。

清王朝的衰败和腐朽在军事上的表现，主要是军制的落后和军备的日益废弛。

鸦片战争以前的清朝经制之兵，由八旗^①和绿营^②两大部分组成。八旗兵在入关前后是比较骁勇善战的。但自满族地主阶级掌握全国的统治权以后，可以世袭的八旗子弟一生下来就享有优厚的薪饷，还有俸地和种种特权，养尊处优的特殊地位使这支部队迅速腐化。平定“三藩之乱”时，清政府先调用八旗兵，结果师久无功，最后只得改用绿营兵打头阵。清代中叶以后，征战之事，就全赖绿营兵了。绿营兵在清朝前期和中期所进行的一些战争中，曾起过显著的作用，但由于制度上存在许多问题，加之乾隆以后，承平日久，暮气日深，战斗力不断下降。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与白莲教起义武装作战表明，绿营和八旗一样，战斗力已经很低。此后，不得不由官吏、地主招募民壮，组成团练武装，对付人民起义。

清统治者长期把骑射奉为“祖训”，制造火器的技术停滞不前，这就使清军的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西方军队。西欧陆军在十八世纪已全部使用火器，而清军则仍然是冷热兵器并用，部队装备着大量弓矢、矛戟、刀斧、椎挺等原始武器。直至 1836 年，清统治者才提出“军储利器，枪炮为先”^③，但不久又继续强调“枪箭并重，不容偏废”^④。因此，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前，清军的装备始终处于冷热兵器并用的落后状态。

^① 八旗兵是在满族部落军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早在 1606 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就开始建立一种兵农合一、军政一体的组织。他把满族各部落的人丁组织起来，每三百人为一牛录，五牛录为一甲喇，五甲喇为一固山。每牛录设牛录额真（汉名佐领）一人，每甲喇设甲喇额真（汉名参领）一人，每固山设固山额真（汉名都统）一人和梅勒额真（汉名副都统）二人。初建黄、白、红、蓝四固山，到 1615 年又增加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固山，共八固山。八固山各用不同的旗色相区别，故称“八旗”。1635 年以后，清太宗皇太极陆续将降附的蒙古人和汉人，按照八旗制度组建为“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合计二十四旗，由它们共同构成清代八旗的整体。

^② 绿营兵由原明朝各省的军队改编而成，因以绿旗为志，以营为建制单位，故称“绿营”。绿营兵都是汉人，一人在伍，全家入兵籍，世代相袭，以兵为业。除京师巡捕营外，绝大部分散驻于全国各地，分为标、协、营、汛，由总督（包括河道总督、漕运总督）、巡抚、提督和总兵节制。总兵以下，设有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等官。

^③ 《宣宗实录》卷二百九十，第 11 页。

^④ 《宣宗实录》卷三百一十七，第 27 页。

清王朝一直保持七八十万常备军，可是，既不注重将弁的培养，又忽视部队的训练。提升将弁，片面强调行伍出身，对于武科出身的往往不予重用。这样，将弁的文化水平一般都比较低，加上缺乏严格的培训，不但平时组织部队训练难于胜任，战时指挥作战更是笨拙无方。至于部队训练，虽规定有春操、秋操、冬季行围等制度，但往往敷衍应付，而且只偏重于演阵图、习架式，近于演戏，基本上没有脱离冷兵器时代的密集阵式，对于实战毫无裨益。

除军队建设问题外，清政府在设防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由于清朝是满族少数民族统治着一个多民族的大国，因而在设防的指导思想上，表现为防内重于防外。乾隆以前，清代用兵的重点一直在东南、西北和西南，因而这些地区逐渐成了设防的重点。固然，上述设防重点地区的军队也负有防外的任务，但主要任务还是防内。从水师建设和沿海设防情况也可看出其防内重于防外的指导思想。清政府虽建立了外海和内河水师，并在少数口岸筑有炮台等防御工事，以防外敌入侵。但就整个水师而言，主要任务在于防止走私和缉捕海盗。正因为这样，在战船的制作上不是侧重于考虑如何有利于海上作战，而是侧重于考虑如何更适于追捕走私船和海盗船。十九世纪初期，清军水师的外海战船共有八百九十余艘，数量比英国的战舰还要多，但质量却相差甚远。军事上防内重于防外的指导思想，还源于清政府长期闭关锁国，和盲目地以“天朝”大国自居的心理。由于对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扩张政策缺乏认识，因而也就谈不上从军事上认真进行对付外敌的准备了。

正是由于清王朝政治和军事日趋衰败，又不重视对外设防，因此，当外国资本主义列强以武力入侵时，就难以作出及时而有力的反应，给侵略者以坚决的回击。

第二节 英国以武力推销鸦片，发动侵华战争

英国资产阶级为了牟取高额利润，最大限度地掠夺中国人民，除了向中国输出一般商品外，还大力倾销鸦片。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英国东印度公司^①获得了印度鸦片出口的垄断权，即在印度大规模地生产鸦片，并以非法手段大量输入中国。鸦片贸易给英国资产阶级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在一段时期内，“印度的不列颠（英国）当局的收入当中，整整有七分之一是来自向中国人出售鸦片”^②。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清王朝从嘉庆初年开始，便正式宣布禁止鸦片进口。这对英国的鸦片贩子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打击。之后，英商在英国政府和印度的英国殖民当局的大力鼓励和怂恿下，贿赂和勾结清朝官吏，大规模地进行鸦片走私，一方面牟取暴利，一方面腐蚀清朝整个官僚体系。因此，尽管清王朝三令五申地严禁鸦片，年输入量仍由十九世纪初的四千箱左右，猛增到1838年（道光十八年）的四万余箱。

鸦片的大量输入，严重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健康和经济生活，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严重危机。上至贵族达官，下至绅商百姓以及八旗绿营兵丁，吸食鸦片的人越来越多。据1835年统计，全国吸食鸦片者约在二百万人以上，而“现任督抚，嗜烟者约占半数”^③，这就加速了清朝统治机器的腐化。鸦片输入激增，使中国在中英贸易中迅速由年出超白银七百余万两转为入超数千万两，造成白银外流、银贵钱贱、国库空虚等严重的经济后果。而这些后果最终又都转嫁到广大劳动人民身上，引起人民的更大不满与反抗。道光帝^④迫于烟毒泛滥的严重形势，害怕有朝一日真会出现“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⑤的局面，乃于1838年冬，改变了以往既畏惧鸦片之害，又不愿放弃因鸦片走私而受贿获利的犹豫摇摆态度，决定摒弃与鸦片走私有密切关系的“弛禁派”的主张，采纳了“严禁派”^⑥的建议。同时，

^① 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00年。它名义上是英国的贸易公司，实际上是英国在印度、中国和亚洲其它国家推行殖民掠夺政策的工具。从十八世纪中叶起，该公司拥有军队和舰队，成为巨大的军事力量。在公司的名义下，英国殖民者完成了对印度的占领。1857—1859年印度的民族解放起义迫使英国人改变其殖民统治形式：宣布公司解散，印度成为英王的领地。

^②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二卷，第7页。

^③ 林则徐：《与弟元抡》，《林则徐家书》（上海共和书局印行）第9页。

^④ 道光帝（1782—1850），姓爱新觉罗，名旻宁，嘉庆帝（顒琰）次子，1820年即位，年号道光。他虚骄自大，对世界情势懵然无知，处事动摇不定，很少了解下情。鸦片战争爆发后，他举棋不定，和战无计，最后妥协投降。1850年病死，庙号宣宗。

^⑤ 林则徐：《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端片》，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以下简称《鸦片战争》——（二），第142页。

^⑥ 鸦片贸易给清王朝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统治危机，在朝野舆论的推动和压力下，清政府内部逐渐形成了主张严禁和弛禁两派。严禁派不满意对禁烟的因循敷衍，要求对贩卖和吸食鸦片者处以重刑。弛禁派则认为

任命在两湖地区禁烟卓有成效的湖广总督林则徐^①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主持禁烟事宜，并节制广东水师。

林则徐于 1839 年 3 月 10 日到达广州后，立即与两广总督邓廷桢^②等整顿海防，严拿烟贩，惩处受贿官弁；同时晓谕外商，限

林则徐画像

期呈缴烟土，出具“永不夹带鸦片”的保证书。在当地人民的积极支持下，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在广东迅速开展起来。林则徐排除了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和鸦片巨商的阻挠破坏，于 4、5 月间，共缴得英美等国输入的鸦片二百三十七万余斤，并根据道光帝的命令，于 6 月 3 日至 25 日在虎门海滩上全部当众销毁。这一果敢的举动，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反抗鸦片侵略的坚强意志和决心，给了英国侵略势力以沉重的打击。自然，英国侵略者决不肯就此罢休，他们决心借机挑起战争，以达其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的目的。

英国决定发动侵华战争是蓄谋已久的。早在 1832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就密令大鸦片商胡夏米乘船自广州北驶，经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山东半岛、山海关等地，对中国沿海作了一次带战略侦察性的航行。1835 年 7 月 24 日，胡夏米在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提出：只要一支小小的海军舰队，就足以制服清王朝。他还对舰队的组成、兵力数量、集结海域和行动季节等等提出了具体建议。^①1838 年 7 月，英国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他伦遵照英国政府的旨意，率领军舰三艘，窜到珠江口，再次对中国进行武力威胁和侦察。同年，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训令义律利用任何有利的机会获取中国沿海贸易场所和海岛的情报，并要他在广州或澳门的公务人员中指定专人从事此项工作，返回后，把所到地方的商业、工业情况以及所获悉的任何有关地理、博物等方面的知识，写成详细报告，以便转呈英国政府。^②1839 年 4 月 3 日，义律以中国收缴鸦片为由，建议英国政府“立刻用武力占领舟山岛，严密封锁广

靠严刑重典不能禁止鸦片，主张弛禁征税，解决财政困难。弛禁派的主张为外国烟贩以及在鸦片贸易中获利的官吏所欢迎。严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林则徐、黄爵滋等。弛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许乃济、穆彰阿、琦善等。

^① 林则徐（1785—1850），清末进步政治家和爱国主义者。福建侯官（今闽侯）人。1811 年进士。曾与龚自珍、魏源、黄爵滋等提倡经世之学，主张刷新吏治，扫除贪污，整顿军备，加强边防等。1831 年任东河河道总督，1832 年改任江苏巡抚。1837 年升湖广总督，任内提出六条具体的禁烟措施，在两湖地区成效显著。1838 年 9 月上奏道光帝，极力赞同黄爵滋以死罪重治吸食鸦片的主张，成为严禁派的著名代表人物。

^② 邓廷桢（1776—1846），江苏江宁（今南京）人。1801 年进士。1826 年任安徽巡抚，1835 年升两广总督，1836 年许乃济奏请弛禁鸦片时，他开始甚表赞同，后受严禁派的影响，且目睹鸦片危害严重，乃由弛禁派转为严禁派，后成为林则徐的亲密同僚。

^① 参见《胡夏米致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的信》，《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下同），第一分册，第 52—55 页。

^② 参见《近代史资料》1958 年第 4 期，第 16 页。

州、宁波两港，以及从海口直到运河口的扬子江江面”，给中国“以迅速而沉重的打击”。^①林则徐虎门销烟后，义律命令英国船主拒绝在“永不夹带鸦片”的保证书上签字。7月7日发生英国海员在九龙尖沙嘴村毆毙中国百姓林维喜事件，义律又拒不交出凶犯。在此情况下，林则徐下令将英国人逐出澳门，并断绝其一切接济。义律离开澳门后，即派人驰报英印总督奥克兰，请求派兵船来华。不久，英舰“窝拉尼”号、“海阿新”号先后抵达广东海面。9月4日，义律率军舰“窝拉尼”号及武装船多艘，闯入九龙湾，炮击清军水师船只。清军水师奋勇还击，将其赶走。

1839年10月1日，英国内阁会议按照资产阶级中对华贸易关系密切的集团和鸦片巨商们的意见，决定派遣一支舰队前来中国海域，发动侵华战争。同年11月4日，巴麦尊正式训令义律和致函海军部，宣布英国政府决定派遣一支远征军前往中国，封锁沿海港口，占领几个岛屿，用炮舰政策迫使清王朝屈服。与此同时，义律又率军舰“窝拉尼”号、“海阿新”号在川鼻湾阻止一艘具结的英国商船入口。清军水师前往查究，遭到英舰炮击，不得不开炮还击，将英舰击退。11月3日至13日，清军又多次与入侵之敌交火，仅在官涌一地，十天之内就打了六仗，均获全胜。以上情况报到北京，道光帝下令永远停止同英国贸易，并驱逐所有英船，于是，中英关系更形紧张。这时，英国为强行向中国推销鸦片而引起的矛盾，已发展到非战争不能解决问题的地步。

1840年2月20日，英国政府正式任命好望角海军司令、海军少将懿律和义律为正副全权代表，并由懿律率领侵华远征军前来远东。4月7日，英国议会下院经过激烈辩论，以二百七十一票对二百六十二票的微弱多数，通过了政府的对华政策。就这样，英国侵略者“为鸦片走私的利益而发动了第一次对华战争”^①。

^① 《义律致巴麦尊的密信》，《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卷，第一分册，第58—59页。

^① 马克思：《新的对华战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56页。

第三节 英国侵华部署与清政府的海防战备

一、英国远征军的组成和作战部署

英国政府作出发动侵华战争的决定之后，即着手组织远征军。至 1840 年初，这支侵略军基本组成。海军舰队以驻印度海军司令伯麦为司令，由十六艘军舰、四艘武装轮船和二十余艘运输船组成。这十六艘军舰中，三艘来自英国本土，三艘来自开普敦^②，五艘来自印度，另五艘已先期在中国海面活动。侵华陆军共四千名，其中包括从锡兰（今斯里兰卡）抽调的英军第 18 团，从印度加尔各答抽调的英军第 26 团和第 49 团，此外，还抽调了一个印度混合营和两个炮兵连、两个工兵连。所有陆军由布尔利上校统率。战争过程中，侵华英军以印度为主要基地，英国驻印度总督奥克兰受命筹组陆军，并对海军的行动予以合作。

1840 年 2 月，英国政府对懿律和义律下达了作战训令，给侵华远征军规定了如下任务和实施步骤：（一）到达广东海面后，立即封锁珠江口，扣留一切中国船只。由于广州距北京太远，所以不在那里进行任何陆上的军事行动。（二）封锁珠江口之后，立即北上，切断台湾和厦门之间的运输，封锁钱塘江口、长江口和黄河口，占领舟山群岛中最适于作司令站以便长期占领的岛屿，并扣留一切中国船只。（三）前往北直隶湾（即渤海湾），递送《巴麦尊子爵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以武力为后盾，与清政府进行谈判，逼迫它接受英国政府提出的关于道歉、赔款、割地、通商等要求。（四）如果清政府拒绝谈判，或者谈判决裂，海军司令就应该根据他所指挥的兵力，采取最有效的办法进行更加活跃的敌对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派一支兵力进入黄河，在黄河与运河的交叉点切断南北诸省的交通；或派一支兵力进至长江与运河的交叉点，掳走那里的船只与货物；如果认为兵力足够，还可以占领厦门。训令指出：“给海军司令留有最充分的自行决断的余地，以便他根据他自己的判断，用最有效的办法进行他的敌对行动；在这样情况下，如果中国政府拒绝满足我们或中止谈判，或迫使陛下全权代表中止谈判，那么海军司令的敌对行动就不该停止，也不中断，一直等到中国全权代表签下足称满意的协定，并由皇帝诏准该协定的时候为止。”训令还给全权代表“保留广阔的自行决断的余地”。^①

二、清政府的海防战备

^② 开普敦位于非洲南端，西临大西洋塔布尔湾，为南非（阿扎尼亚）重要港口和开普省首府。1652 年荷兰殖民者侵入南非沿海地带，始建该港。1806 年英国殖民者侵入南非，夺取开普，开普敦港便成了英国向南非内陆和亚洲各地扩张的重要基地。

^① 《巴麦尊致海军部》，《近代史资料》1958 年第 4 期，第 70—72 页。

（一）清王朝的战备方针

清朝最高统治集团，对于收缴鸦片之后中英之间将会出现何种局面，是否可能爆发战争等，从未进行廷议，作出应有的分析判断，提出相应的政治军事对策，仅由道光帝及军机大臣们看奏报，下谕令。而道光帝既昏聩无知，又狂妄自大，他不准沿海疆臣丢失寸土尺地，又不愿为加强海防动用国库银两。清朝同西方各国通商近二百年，道光帝对欧美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政治经济制度，竟茫无所知。英国借口鸦片问题，已经在调兵遣将，决心武装侵略中国了，他还认为是“虚声恫吓”，“实无能为”，只要严防海口，“总不与之外洋接仗”，就足以使敌不攻自毙。在这种骄妄无知、盲目轻敌的思想支配下，清廷逐步形成了如下政治、军事战略性方针，即“先威后德”，“大张挞伐，聚而歼旃”，“沿海一体严密防范”等。所谓“先威后德”，即驱逐英商，收缴鸦片，必要时“示以兵威”，“使奸夷闻风慑服”；然后许以继续通商，“以示怀远羁縻”，认为这样，英人就会“感恩天朝”了。显然，这是既不知彼又不知己的骄妄自大思想的产物。至于“沿海一体严密防范”，由于没有提出明确而具体的措施，实行起来，只能是分兵把口，处处消极防堵而已。

（二）东南沿海的设防备战

东南沿海是清朝布防重点之一，其中广东驻军七万，福建六万，浙江四万，江苏五万。但是，由于清军的主要任务是镇压人民的反抗与起义，沿海水师主要是缉拿海盗，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武装侵略缺乏应有的警惕。1800年（嘉庆五年）以后，清政府查禁鸦片，英国的武装走私商船开始在广东沿海活动，特别是1830年以后，英国政府公然派出兵船前来中国沿海，保护鸦片走私，清廷和广东当局对西方列强的军事威胁，才开始有所警惕和准备，但仍然缺乏认真的战备措施。

1834年9月，两艘英国军舰强行闯入虎门并进抵黄埔的严重

关天培像

事件发生后，清廷任命关天培^①为广东水师提督。关到任后，亲历重洋，查勘要塞，整顿水师，加筑炮台，添铸大炮，使广东海防尤其是虎门的防务，得到了加强。

虎门位于珠江入海处，是从海上进入广州的咽喉要地，地势十分险要。沙角山、大角山夹岸对峙，构成第一道门户。由沙角、大角沿江上溯七里，

^① 关天培（1781—1841），清末爱国将领。江苏山阳（今淮安）人，行伍出身。曾任江苏太湖营水师副将，1827年升江南苏松镇总兵，1833年署江南提督，次年任广东水师提督。

有上下横档岛耸立江中，将水道分隔为二。东航道可通大船，为洋船进入广州的唯一水道，两岸山峰雄峙，构成第二道门户。由横档岛再上溯五里，江中有大虎山岛，构成第三道门户。沙角山、大角山均筑有炮台（沙角炮台筑于1801年，大角炮台筑于1832年），关天培以两台间的炮火不能形成交叉火力，无法封锁海口，将其改为信号炮台，担负了望警报任务。上横档岛早在1717年（康熙五十六年）即修筑了横档炮台，其东岸之南山（亦称武山）修筑了威远炮台；1815年（嘉庆二十年）又在威远炮台北侧修筑了镇远炮台。关天培到任后，于威远、镇远炮台之间添筑了靖远炮台，于上横档岛西端添筑了永安炮台，西岸南沙山（即芦湾山）添筑了巩固炮台。到鸦片战争时，横档地区共有炮台六座，安置新旧火炮二百一十二门。此外，在两广总督邓廷桢的积极支持下，关天培还在横档岛和南山之间建造了两道铁链，以防敌舰闯入。对1818年修筑的大虎山炮台，关天培到任后也作了加固，并添置了炮位。

关天培不但添筑炮台，增加炮位，在炮台构筑方面也作了一些改进。旧的炮台均系石墙石地，一经炮弹轰击，碎石横飞，反而增大敌炮的杀伤力。新筑的炮台则以巨石为基，上筑三合土墙，并增加胸墙厚度，用沙袋或三合土围护火药库。此外，还部分改建旧炮台，以减少战时损伤。每门火炮还用增减木垫的办法，调整射距。但所有新旧炮台，仍未脱离古代城堡的结构形式，长墙高台，既无掩盖，又无交通壕，战时人员、火炮易受损伤。

福建也是重点设防的省份之一。全省六万驻军中，大体水陆各半，分别由水师提督和陆路提督统辖，下设南澳、漳州、台湾、金门、海坛、福宁等镇。福建沿海设防情况远不如广东，海口“旧设炮台，大者不过周围十余丈，安炮不过四位六位，重不过千斤”^①。英国鸦片走私船在广东被逐以后，自1839年冬起，就不断向福建沿海窜扰。1840年3月，新任闽浙总督邓廷桢由粤抵闽，立即增强沿海兵力，分饬水陆官兵加意严防，并自广东购得洋炮十四门，添筑炮台，加强福建防务。鉴于形势紧迫，永久性炮台来不及构筑，兵部尚书祁雋藻建议以炮墩^②代替炮台，于沿海险要处用沙袋筑成简易炮台，以资御敌。

^① 祁雋藻：《议设炮墩控制英船及奸民贩烟船只片》，《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中华书局1964年版，下同）（一），第291页。

^② 据祁雋藻《议设炮墩控制英船及奸民贩烟船只片》载：炮墩的构筑方法是：“用麻布袋，每个长四五尺，径尺余，实以沙土，层层堆积，高低自五层以至十余层，厚薄自两层以至三四层，长短自十余丈以至百余丈，相地势之远近、广狭斟酌为之。沙墩之外，用旧小渔船侧竖，船底向海，船舱向内，紧贴沙袋，牢固拴缚，以为沙囊保护。炮位安于墩内，炮口出于船外，其两船夹缝处所，即是天然炮洞。我兵在内瞄准施放，可以克敌，而全身藏于墩内，敌人炮子不能致伤。……沙性最柔，非如砖石可以摧裂，弹子打穿船底，遇沙即止，不能穿过，极为稳固。”

（三）林则徐的战备措施

林则徐抵粤后，在严厉禁烟的同时，陆续采取了一系列战备措施，以应付日益紧张的形势。这些措施是：整顿水师，严肃军纪，演练枪炮，以提高战斗力；在尖沙嘴、官涌等处新建炮台；秘密购置西洋大炮，使虎门各炮台的大炮增至三百余门；购置西洋大船，改装民船，招募渔民、蛋户（以舟为家的土民）丁壮五千余人，加以训练，准备杀敌；此外又抽调广东内地营汛防兵，加强第一线兵力，使虎门的水陆兵力增至三千余名，澳门增至一千三百余名，尖沙嘴增至八百余名。

林则徐还就如何对付英军入侵问题，提出过一些具体设想，概括起来，其基本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守为战，以逸待劳。他在 1840 年 3 月 7 日的奏折中写道：英人“妄夸炮利船坚，各夷船恃为护符，谓可沮我师之驱逐。臣等若令师船整队而出，远赴外洋，并力严驱，非不足以操胜算，第洪涛巨浪，风信靡常，即使将该夷船尽数击沉，亦只寻常之事。而师船既经远涉，不能顷刻收回，设有一二疏虞，转为不值，仍不如以守为战，以逸待劳之百无一失也。”^①

第二，在近海陆地歼敌，不在远洋接仗。林则徐于 1839 年 9 月奏称：有些被英吉利之名所震惊者，往往以其船坚炮利而称其强，而不知其兵船笨重，吃水深至数丈，仅能取胜外洋，只要不与之外洋接仗，其技即无所施。该兵船一旦进入内河，就会运棹不灵，一遇水浅沙胶，更难转动。其货船进口，尚需以重金雇请当地人导引，兵船则更不待言。“且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②

第三，组织民众，军民配合，火攻英船。林则徐到广东以后，一直比较注意依靠民众，陆上则组织乡勇、团练，水上则招募渔民、蛋户等，以便配合军队作战。1840 年 3 月，他与关天培等密商，决定将平时所装大小火船，即雇渔蛋各户，教以如何驾驶，如何点放，每船领以一二兵弁，分赴各洋岛澳埋伏，候至深夜，察看风潮皆顺，即令一齐放出，乘势火攻环护夷船之各匪船，随烧随拿，“许以烧得一船，即给一船之赏，如能延烧夷船，倍加重赏”。^③

第四，与沿海各省协力筹防，共同对敌。广东封港以后，为防止英国侵略者北窜，清廷令沿海各省督抚严加防范，林则徐对此甚为重视。6 月下旬，大批英舰抵粤，他便“飞咨闽、浙、江苏、山东、直隶各省，飭属严查海口，

^① 林则徐：《英船被逐出口仍在外洋逗留并拿获汉奸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 277—278 页。

^② 林则徐：《英人非不可制请严谕查禁鸦片片》，《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 217 页。

^③ 林则徐：《英船被逐出口仍在外洋逗留并拿获汉奸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 278 页。